

1949—1966年中国博物馆女性从业者群体考察*

On the Female Practitioners of China Museum from 1949 to 1966

徐 玲

Xu Ling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郑州, 450001)

(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内容提要: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重要公共文化机构, 博物馆以独特方式留存了大量的时代文化印记。这一时期女性获得职业平等赋权的标识——博物馆女性从业者群体的形成, 同样被留存在中国博物馆史上, 为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博物馆文化发展和女性社会身份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特殊镜像。

关键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 博物馆女性从业者群体 女性社会身份 博物馆史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RC, museums have preserved a large number of cultural traces of the times in a unique way. In this period, the symbol of women's equal professional empowerment, the formation of museum female practitioners group, was also preserved in the museum history of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RC, which provided a special mirror image for ob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museum culture and the change of women's soci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RC.

Key Words: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RC; female practitioners of museum; women's social identity; museum history

近代中国博物馆引进伊始即以社会教育方式存在, 但因其藏品研究的专业性和管理的复杂性, 对其从业者能力要求较高。加上早期博物馆整体数量有限, 1949年前进入博物馆工作的女性较少。随着以“解放”为主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国家赋予了女性平等受教育、就业、参政议政及婚姻自主等权

利, 使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成为可能。博物馆方面, 1949年后为满足文博事业人才的需求, 采取在高校开设博物馆专修科、在博物馆工作实践中培养在职从业者以及举办短期培训班等方式提升女性的专业素养, 为博物馆女性从业者群体的生成提供了条件。女性从业者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博物馆从业者的性别结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物馆史研究(1949—1966)”(项目编号: 18BKG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构,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女性社会身份变化的一个特殊标识。考察1949—1966年博物馆女性从业者群体无疑是博物馆文化和女性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视角。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关于该议题的直接研究成果近乎缺失。对本文启发较大的是对图书馆女性从业者群体的相关研究成果,如刘菡的《北美“图书馆中的女性”研究:重要著述、主要学者及研究框架》^[1],从女性主义视角述评大量国内外关于女性图书馆职员的相关研究成果,促成本文转向对博物馆女性从业者群体的思考。相对而言,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女性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集中于文学、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如钟雪萍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一个有四种说法的故事》^[2],重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妇女解放运动对女性主体性提高的历史贡献;唐海迪的《新中国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女性性别形象(1949~1966)》^[3],论述了这一时期的男女平等观、女性性别形象等;李玮琦的《中国博物馆与女性形象呈现(1949—1966)》^[4],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博物馆中的女性形象展示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在搜集整理1949—1966年博物馆女性从业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尝试系统考察该群体的整体构成、来源及社会意义等,以细化博物馆史的研究。

一、博物馆女性从业者群体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是博物馆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博物馆改造和新建活动同时进行。作为专业文化机构,一方面新的工作开展需要大量的从业者,一方面已有的博物馆从业者人数捉襟见肘。1950年全国博物馆状况如下:

(一)国立博物馆四所(北京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南京博物院)(二)省(市)立的博物馆十六所(天津二所,杭州,青岛,南通,承德,上海,沈阳二所,锦州,成都,西安,大连二所,旅顺,开封)干部三百三十一人……要把中央的几个博物馆,成为“母机”,翻制出若干小型博物馆的标本,在各地逐渐成立,同时也可在

工厂、农村、军队里展开“展览”工作。^[5]

仅有的331人明显难以满足博物馆建设的人才需求。据沈从文回忆,20世纪50年代时博物馆“还是个新事业,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实在并不多”^[6]。1949年,北京历史博物馆全馆工作人员不足20人^[7]。1951年天津第一、第二两博物馆的职工人数“共计14人,多数不熟悉业务”,以至于文化部认为,“第一、二两博物馆在原有基础上,不可能发展成为正规博物馆。建议把这两个博物馆都改为文化馆”或者“集中力量先筹建一所”^[8]。1951年的河南省立博物馆,职工只有35人^[9]。当时多数博物馆筹建期职工为个位数,甚至只能借调其他文化单位的人临时负责筹建工作。面对这一局面,博物馆不得不大量招收新人入职,以扩大从业者队伍。1953年全国最大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职员增加至830人^[10];1954年底,西南博物院职员99人;1958年,北京历史博物馆职员145人;筹建中的革命博物馆职员97人;安徽省博物馆职员173人^[11]。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女性从业者的身影出现在博物馆的各个岗位上,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新时代风景线。

囿于1949—1966年女性博物馆从业者相关资料留存数量,研究只能在可见的零星材料的基础上展开,在此按照首次入职博物馆机构的时间先后将此时期能够查到信息的博物馆女性从业者个人情况整理如下(表1)。

尽管表格中博物馆女性从业者一些个人信息有缺失,但其作为1949—1966年博物馆从业者的身份是基本确定的^[12]。当然,因为目前可见档案材料有限,该表格应该是开放性的,随后有新的发现可以进一步细化。但整体上看,表格基本能够反映出这一时期博物馆女性从业者的构成。她们的教育背景、身份、入职动机等都很复杂。教育背景上,既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讲解员、保管员、勤杂工等,也有毕业于著名大学的专业研究者和领导者;身份上,既有革命家夫人、学者夫人、军人及名人之后,也有普通家庭的女性;入职动机上,尽管此时期博物馆工作收入不高,一些中学毕业的女性迫于生计进入博物馆工作,但也有作为职业追求而入职

表1 1949—1966年中国博物馆女性从业者情况一览表

姓名	单位	入职年份	教育背景	备注
曾昭燏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1938	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本科 伦敦大学考古学硕士	馆长
	南京博物院	1950		
游寿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1943	福州女子师范学校 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本科 金陵大学国文系硕士	资料组
	哈尔滨师范学院 历史系文物室	1960		
刘敬亭	山东省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	1949	?	保管部
	山东省博物馆	1953		
何正璜	西北大学历史系	1945	武昌艺术专科学校 东京多摩川高等美术学校	王子云夫人 社教部 陈列部
	成都艺术专科学校	1949		
	陕西历史博物馆	1950		
金书琴	故宫博物院	1951	?	群工部副主任
梁德英	故宫博物院	1951	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傅振伦夫人，美工组
蔡心瑜	西南博物院	1951	湖北省立女师范学校	办事员
潘必琼	西南博物院	1951	辅成法学院七期法律系	办事员
申平	西南博物院	1951	四川省立重庆女子师范学校	办事员
	四川省博物馆	1955		
梅润华	西南博物院	1951	江苏武进县立女子高中师范	保管组
	四川省博物馆	1955		
李世芸	西南博物院	1951	北大考古培训班	革命者夫人
	重庆市文物商店	1955		
蔡佑芬	西南博物院	1951	北大考古培训班	
	重庆市革命纪念馆	1955		
晏学	西南博物院	1951	北大考古培训班	
	贵州省博物馆	1955		
唐淑琼	西南博物院	1951	北大考古培训班	
	四川省博物馆	1955		
马月仙	西南博物院	1951	北大考古培训班	
	云南省博物馆	1955		
水良箴	西南博物院	1951	北大考古培训班	
	辽宁省博物馆	?		
纪秋晖	北京自然博物馆	1951	北大博物馆专修科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1952		
	中国历史博物馆	?		

续表

姓名	单位	入职年份	教育背景	备注
杨诒芳	中国历史博物馆	?	北大考古培训班	
郑振香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1952	北大博物馆专修科	考古
钟银兰	上海博物馆	1952	中学生，师从沈剑知	书画鉴定
陈佩芬	上海博物馆	1952	上海市静文女中初中生，师从蒋大沂	青铜鉴定
黎金	广州市文管会	1952	北大考古培训班	麦英豪夫人，考古
	广东省博物馆	?		
孙泳贤	安东地志博物馆	?	北大考古培训班	
陈默溪	贵州省博物馆	1953	北大考古培训班	
傅启群	西南师范学院	1953	西南师范学院图博专修科	傅葆琛之女
王平贞	西南师范学院	1953	西南师范学院图博专修科	
	四川省博物馆	?		
郭宗萱	云南省博物馆	1953	西南师范学院图博专修科	
曹祚沅	西南博物院	1953	西南师范学院图博专修科、北大考古培训班	
简菊华	西南博物院	1953	西南师范学院图博专修科	
	贵州省博物馆	?		
袁有贞	西南博物院	1953	西南师范学院图博专修科	
刘贞廉	四川省博物馆	?	北大考古培训班	
李彦欣	中国历史博物馆	?	北大考古培训班	
谢炳志	中国革命博物馆	1954	?	军人出身，陈列部
白丽娟	故宫博物院	1954	师从于倬云	古建部
穆益勤	故宫博物院	1954	北大历史专业本科	绘画组
郑笑梅	山东省博物馆	1954	北大考古专业本科	考古
白绍芝	湖北省博物馆	1954	北大考古培训班	谭维四夫人，保管部
王劲	湖北省博物馆	1954	湖北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北大考古培训班	考古
冯忠莲	荣宝斋	1954	辅仁大学美术系本科	陈少梅夫人，书画组
	故宫博物院	1972		
沈令容	故宫博物院	?	?	沈尹默之女，资料组
居瀛棣	故宫博物院	?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本科	居正之女，资料组
张宗屏	贵州省博物馆	?	北大考古培训班	
马月贞	中国历史博物馆	?	北大考古培训班	
	天津市博物馆	?		

续表

姓名	单位	入职年份	教育背景	备注
薛雯	中国革命博物馆	?	?	征集保管部主任
庄云霞	上海博物馆	?	?	社教部
朱淑仪	上海博物馆	?	?	社教部
刘津	故宫博物院	?	?	办公室副主任
杨玲	故宫博物院	1956	高中生	陶瓷组
陈娟娟	故宫博物院	1956	高中生, 师从沈从文	织绣组
张丽英	故宫博物院	1956	高中生	织绣组
王莉英	故宫博物院	1956	中学生, 师从陈万里、孙瀛洲	陶瓷鉴定
徐静修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1956	中学生, 师从孙瀛洲	陶瓷鉴定
叶佩兰	故宫博物院	1956	中学生, 师从孙瀛洲	陶瓷鉴定
叶淑穗	鲁迅博物馆	1956	北师大本科	
许羨苏	鲁迅博物馆	1956	北京女师大国学本科	鲁迅学生
唐荣芳	中国历史博物馆	1956	北大考古本科	
陈赛英	上海自然博物馆	1956	厦门大学生物系本科	动物学
郝明珠	故宫博物院	1957	?	军人出身, 群工部主任
言行	上海博物馆	1957	?	革命家夫人, 副馆长
廖静文	徐悲鸿纪念馆	1957	金陵女子大学, 北大中文本科	徐悲鸿夫人, 馆长
伊文	故宫博物院	?	?	办公室主任
梁秀芝	山西省博物馆	1958	南开大学历史本科	陈列部
邱辛	中国革命博物馆	?	?	群工部主任
邱莲卿	上海自然博物馆	1959	复旦大学生物学本科 云南大学生态地植物学硕士	生物学专家
夏立平	中国革命博物馆	?	?	征集保管部副主任
姚锡佩	北京鲁迅博物馆	1961	南开大学中文本科	
陈淑芳	郑州市文物陈列馆	1961	中学生	财务
程方英	上海博物馆	?	?	陶瓷鉴定
杨翼文	郑州市文物陈列馆	1962	?	馆长
边宝华	北京历史博物馆	1962	中央美术学院国画本科, 师从沈从文	美工组
祁慧芬	山西省博物馆	1963	北大考古本科	
夏燕月	中国革命博物馆	1964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本科	社教部
江明	故宫博物院	?	?	群工部主任
赵灵芝	郑州市文物陈列馆	1965	中学生	田野
王学敏	河南省博物馆	1965	郑州回民中学	社教部

的。受教育机构上,比较集中于当时开设博物馆专门化教育的北大、西南师范学院以及南开大学等高校,职业短期培训性质的北大考古培训班同样为博物馆培养了一批优质的女性从业者。整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博物馆为女性职业进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如许多专家乐于帮带女性从业者,使之能够从普通员工成长为行业专家,典型的有故宫博物院的陈娟娟、王莉英、叶佩兰,上海博物馆的钟银兰、陈芬等。

二、博物馆女性从业者群体的来源

民国时期已有少量知识女性进入博物馆工作,如曾昭燏、王介忱及游寿等,三人均受过高等教育,就职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其中曾昭燏不但有留英生身份,还有德国博物馆工作的经历。尽管如此,整体上民国时期的博物馆从业者仍以知识男性为主。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和就业权,是女性进入各种职场的前提。1949年后,促使博物馆女性从业者群体生成的因素较多,关键性的因素无疑是国家教育方针和人才培养方式的改变。1952年全国实行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政策,使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竞争进入高校学习的机会。1953年高校女生占比达25.28%^[13]。具体到博物馆方面,促使女性从业者群体生成的教育方式,既有高校专业化的教育,如北大博物馆专修科、西南师范学院图博专修科以及南开大学博物馆专门化班等;也有大量博物馆内师徒相传式的职业训练以及文化部门主办的在职培训班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高校博物馆专业化教育始自北大博物馆专修科的开设。北大筹设博物馆专修科的动议始于1947年,该年成立的由胡适、裴文中、杨钟健、韩寿萱、唐兰等组成的北大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提议在文学院成立图书馆、博物馆专修科,并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博物馆专科规程》,但是一直处于试办阶段,未能正式招生。1949年,重提北大设立博物馆专修科事宜。1949年7月22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批准北大正式成立博物馆专修科。由北京历史博物馆馆长韩寿萱任专修科

主任并于当年招生,学制两年。具体情况如下:

设有历史博物馆、美术博物馆及科学博物馆三组。学习课程,共同必修的计有:政治课、博物馆学、模型制造、编目陈列、博物馆技术等。此外,在历史博物馆、美术博物馆及科学博物馆三组范围中,就自己的特长兴趣,任择一种博物馆,作自己较专门的学习目标,所选修的课程也是与此有关的。^[14]

1950年入学的郑振香回忆:“其实当年我本来是想报考历史系的。但历史系是北大的顶尖学科,特别难考,我自己也没十足把握,所以退而求其次,选择了难度相对较低、在当时属于新兴专业的博物馆专业。”^[15]由此可见当时博物馆专修科不但面向社会招生,而且考取难度不大。尤其难得的是为了满足博物馆专业实践性强的需要,北大还为专修科学生提供了良好的辅助教学设备和社会实践机会:

有一个综合性的博物馆,除了供教学用外,并开放任人参观。此外还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图书馆和图片室,存有很多考古美术的图书,两千多张照片、图片和幻灯照相等设备,可供实习研究之用。除了在课堂上学习外,同学们还经常参观京市的博物馆和展览会,并时常举行关于博物馆方面的专题演讲。同学们不仅学习正课,为了理论联系实际,他们还积极到校外服务。例如本年春节科学普及局举办的“科学知识展览会”,该校同学们便参加了“从猿到人”的陈列及解说工作。^[16]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合并,博物馆专修科停办。1949年该专修科首届招生20名,次年招生10余名^[17]。两届招收培养的女生有纪秋晖、岳凤霞及郑振香等。

此后的西南师范学院图博专修科同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女性提供了接受博物馆专业教育的机会。1951年9月10日,作为大区政府负责文教工作的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致函西南师范学院,表示愿意提供办学经费,在该校增设图博专修科。1951年该专修科首届博物馆组招生11人,次年招生21人。1953年6月教育部指示该校图博专修科停止招生^[18]。

1952年该图博专修科分两类招生：一是图博职员培训，修业年限为1年，带有明显的职业培训色彩；一是应届生，延长修业年限为2年。调整后博物馆组招生情况为4名一年制，17名二年制，应届生是在职人员的四倍多，侧面反映出博物馆从业人员的不足。该专修科为西南地区培养了一批女性博物馆人才，如王平贞、郭宗萱、曹祚沅、简菊华、傅启群及陈丽琼等。

1960年3月文化部全国文物博物馆会议上，为落实文化部制定的《文博事业8年规划纲要（1960—1967）》中提出的：加强文博队伍的培养，采取正规训练和工作中培训相结合的方针，逐步在综合大学内建立博物馆系和博物馆专业，决定将文博事业干部的培养纳入整个文化艺术教育工作的体系。后经讨论决定先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设置博物馆专门化班，同时计划在各大协作区范围内选定一所大学建立文博专业或专门化班。南开大学博物馆专门化班于1960年4月7日正式开课，生源自该校历史学专业四年级学生中选拔：

他们都已修完了大部份历史学基础课和政治理论课以及其它辅助课程，在今后的一年半中，除共同课程外，主要将按专门化课的要求进行有关博物馆学专业知识的学习。已开设的

课程有基础课博物馆学概论，辅助课历史档案学以及文物考古等专题讲座。除课堂讲授外，还将结合课程特点，在京津各大博物馆进行参观实习，现场教学。^[19]

当时该专门化班作为大学博物馆专业筹建的预备受到全国文博单位的高度重视，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均给予了大力支援；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还亲自讲授博物馆学和文物考古专题的部分课程；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指派专人参加组成教学小组，负责协助制订教学规划、课程安排以及师资的聘请^[20]。因材料缺失，南开大学博物馆专门化班学生培养情况不详。

博物馆工作实践性很强，尤其是器物鉴定技能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实践才能习得，馆内培训无疑是提升从业者专业技能的一种优选模式。早在1936年，上海市博物馆就公开招考高中毕业生作服务生，并在馆内举办培训班进行专门训练。陈端志、叶恭绰、黄宾虹、商承祖（应为“商承祚”）、杜定友等均参与授课，共授课3个月，实习3个月^[21]。河南博物馆也有招实习生培养的例子，荆三林就是当年河南博物馆培养的练习生^[22]。1949年后面临人才不足的现状，多数博物馆为了开展工作，不得不采取向社会招聘中学生的方式来增加职员，导致从业者普遍文化水平不高（表2）。

表2 郑州市文物陈列馆1957—1965年职工人数及文化结构统计表^[23] （单位：人）

年份	职工总数	大专以上	中专	高中	初中	初中以下
1957	3	0	1	0	1	1
1958	8	1	1	2	2	2
1959	8	1	1	0	4	2
1960	15	1	3	4	5	2
1961	19	2	2	7	5	3
1962	12	6	2	1	2	1
1963	12	7	2	0	2	1
1964	20	7	2	5	5	1
1965	22	6	2	5	8	1
1966	21	5	2	5	8	1

由表可见,这一时期博物馆从业人数严重不足,1957年郑州市文物陈列馆仅有工作人员3人,“1957年建馆时,人员少,一无专职保管人员,二无文物库房,仅有登记帐册,手续很不完备”^[24]。3人中仅有一人为中专文化水平,其余2人为初中及以下。后边情况虽有所变化,但整体上博物馆从业者中受过大学教育者占比较小。史树青回忆1950年左右北京历史博物馆职员情况说:“当时历史博物馆的一些员工都是中学毕业,连大学毕业的都很少。”^[25]1953年河南省博物馆设立宣教组,后改为群工股,成员主要由中学生、文工团员组成。迁郑后的1963年配合政治中心的临时展览增多,河南省博物馆还不得不大量招收临时、合同讲解员^[26]。1956年,许羨苏信中谈到当时鲁迅博物馆“新进来了许多高中毕业生,一部分是已经考上大学的义务劳动者,一部分是没有考上而分配来的”^[27]。对这些文化水平较低的职员进行馆内培训,无疑是一种有效提高其业务技能的途径。师徒相传式的培训为进入博物馆工作的年轻女性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许多女性由此成为行业专家。这一时期博物馆馆内培训比较集中的有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上海博物馆1952年开馆时招收了一批中学生,“博物馆专门请来杨宽、蒋大沂、蒋天格、郑为等教授和专业人员,为这批新招收人员上历史、文化和各类文物知识课程”^[28]。当时高中没毕业的陈佩芬进入上海博物馆后,馆内“专门指定蒋大沂先生做陈佩芬的老师,教授文化和文物知识。蒋先生博学多才,尤精金石和古代文献”^[29]。后逐渐成为博物馆青铜器鉴定方面的专家:

1952年,当时年仅17岁、还在就读高中二年级的陈佩芬由于家境的原因,报名参加了就业考试。那时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正在筹备上海博物馆的建设,为开馆需要,向社会招聘了一批失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陈佩芬通过历史和语文考试被录取,随后分配到了上海博物馆,不久后进入保管部编目组工作。……1959年……原来的编目组调整为征集编目组,主要负责进馆文物的第一步筛选,这对工作人

员的业务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了培养专业骨干力量,当时的领导班子决定实行老师带学生的“一对一”教学方式,指定蒋大沂先生教授陈佩芬。^[30]

与陈佩芬同年以讲解员身份招入上海博物馆的高中生钟银兰,入馆被分在编目组。因为上海博物馆收藏书画较多,1959年,馆里安排钟银兰跟随著名书画家沈剑知学习书画鉴定,钟银兰后成为博物馆书画鉴定专家。这一时期上海博物馆馆内培养起来的女性业务骨干还有陶瓷鉴定方面的程方英,社教方面庄云霞、朱淑仪等。

1956年故宫博物院招收了一批高中生,其中多数为女性,如王莉英、陈娟娟、叶佩兰等,博物院安排专门的辅导员指导这些新入职者。时任院长吴仲超感觉到:“故宫博物院人员编制不多,而陈列、保管、群工、古建修缮等等,五花八门,都需配备人力。”^[31]为了培养“一大批专家和业务骨干”,提出了“老专家带徒弟的培养计划”^[32]。王莉英由此正式成为孙瀛洲的徒弟。与王莉英不同的是,当年的叶佩兰已考上了河北大学,但是因家人反对出京没有去上,受好奇心驱使去应聘故宫博物院,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1958年调到保管部工作遇见孙瀛洲,“那时我在保管部是最年轻的。因为故宫历届领导都主张培养接班人,所以那时我就跟孙老在一起工作、学习”^[33]。回忆自己能够到博物馆工作是一种幸运:“五十年代博物馆不是很热门,而且人们一般也不太喜欢这样的工作……从业务学习方面来讲,那时我们每周有半天的业务学习,有时孙老给我们讲,有时冯先铭先生给我们讲。在库房随时指导学习。”^[34]徐静修同样是跟随孙瀛洲学习陶瓷鉴定,后成为陶瓷大家的。而故宫博物院的另一位织绣专家陈娟娟1956年以高中生身份招进故宫博物院,“当时故宫招实习馆员,陈娟娟高中毕业以后,就去考了”^[35]。后拜当时在故宫博物院兼职的沈从文为师学习织绣:

当时织绣组的陈娟娟同志,还是刚走出学校的女学生,对织绣文物没兴趣深入地研究。沈先生到故宫之后,像慈父爱护自己的女儿一样,亲切辅导,手把手将古代织绣文物的时代特征、艺

术风格详细地讲给她听,使她慢慢爱上了织绣文物研究这门专业。^[36]

沈从文的另一个女弟子则是1962年入职中国历史博物馆、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边宝华,分配在美术组参加陈列设计、临摹和创作工作。入馆后拜沈从文为师,进行专业训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文物、博物馆均被归在考古领域,博物馆在职人员培训纳入考古人员培训。影响较大的是1952—1955年在北大举办的四期考古培训班,大量博物馆从业者接受了该培训班的专业训练,成长为博物馆业务骨干。当时进入该培训班的多是“由各地文管会、博物馆推荐保送”的,结业后再回到文博单位工作^[37]。在四期培训班中结业的博物馆女性从业者多达几十位,成为1949—1966年博物馆女性从业者群体的主体。

徐湖平曾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博物馆人才情况:

专业干部方面,在解放初期仅有少数的本科毕业生,留学业成回国者更是凤毛麟角。50年代国家组织了几起考古专业培训班,从这里毕业的干部后来大都成为各个博物馆发展的中坚力量。由于没有专业学校,保管员大都是由其它行业转来和招收的社会青年,这些同志凭着对文博事业的忠诚,边摸索边工作,经过多年实践,他们有了丰富的经验,但他们也存在着缺乏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博物馆工作规律训练的缺陷。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们国家培养的一批历史、考古专业人才充实到各博物馆,目前这些同志大都是各大博物馆的领导或专业骨干,对博物馆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38]

这可作为这一时期博物馆女性从业者群体来源的一个注脚。

三、社会意义

一般而言,能够接受平等教育、走上职场,并在公共领域扮演新角色等均是女性社会身份提升的表现。尽管整体上此时期女性从数量、工作层位等方

面,与博物馆男性从业者比尚有一定的差距,但作为一种可以出现在博物馆公共空间的职业群体,女性从业者群体的社会意义远大于其工作本身。

一方面,女性进入职场,是女性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前提。博物馆女性从业者作为一个职业群体的形成,反映了1949年后性别观念的进步。博物馆无差别地接纳女性从业者,是 societal 对女性进入职场的一种肯定和鼓励,也是博物馆对国家男女都一样观念的实际表达,即如宋庆龄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女性的完全解放,“是有具体的保证,不是托诸空言的”^[39]。如孙瀛洲就多次勉励王莉英、叶佩兰等女弟子说:“各行各业都出专家,多数是男同志。你要努力学习,成为中国的女陶瓷专家。”^[40]在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下,女性得到了重新审视自己、重塑社会身份的机会,先后成为陶瓷鉴定、青铜器鉴定、书画鉴定、织绣研究、社会教育等方面的专家。其中陈娟娟1960年发表的《明代的改机》^[41]一文影响很大。事实上,1949—1966年博物馆女性从业者多数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职业成就。

另一方面,1949—1966年女性作为独立职业群体出现在博物馆工作岗位上,褪去了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以社会建设者身份出现,打破了传统社会性别空间界限和职业壁垒,成为一种新的职业力量。女性在博物馆机构中初步拥有了自我言说的能力,尤其是一些女性专家领导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博物馆机构领导“无女性”的局面,如馆长曾昭燏、廖静文及杨翼文等,副馆长言行。还有很多女性从业者出任各部室领导,如谢炳志1959年被任命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总体设计组副组长兼文物组合组组长,负责召集研究人员、美工设计人员和总体设计师参加的会议,研究各个时期重点单元的文物如何组合表现等。这些均促使博物馆对待女性问题的态度和视角发生了变化。以博物馆展览视角为例,在博物馆女性从业者群体产生之前,博物馆陈列文物中的女性信息常常被忽略。如隋代贵族女子李静训墓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

她的棺材是用青石雕成大殿的形式,随葬品共计有150多件,其中包括男女陶侍俑60件,

还有武士俑,金、银、玉器也不少,其中的嵌珍珠宝石鎏金蝶头饰、嵌珍珠宝石项链等都是
一级文物……^[42]

中国历史博物馆基本陈列在“隋末农民战争”
陈列中展出了“李静训墓复原模型”:

随葬品按出土时的状况复原(殿外石
棺)——簇拥着卫士、男仆、女侍,殿内(石
棺内)满布金、银、玉饰和器物,专门设计了特
制柜,并将石棺一面立板打开,棺内设置灯,
让观众既可看到石棺的全貌,又可看到棺内的
文物。这个设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43]

整个陈列中,墓主人的女性身份完全被实物湮
没。当然囿于时代观念,这种忽略个体生命信息的
陈列比较常见,女性多以配偶或者次要角色出现在
纪念类展览中,如上海鲁迅纪念馆常设展览中的许
广平,延续了贤妻良母的传统女性身份叙事模式。
但是随着女性从业者的增多,情况开始有所变化。
1959年故宫博物院在乾清宫专门举办了明清女画
家作品展^[44]。一些女性如刘胡兰、江竹筠、赵一曼、秋
瑾等均以国家建专题纪念馆的形式进入国家纪念行
列。这些均使博物馆成为女性主体身份建构和表达
的特殊空间。

注释

- [1] 刘菡:《北美“图书馆中的女性”研究:重要著述、主要学者及研究框架》,《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年第2期。
- [2] 钟雪萍:《“妇女能顶半边天”:一个有四种说法的故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 [3] 唐海迪:《新中国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女性性别形象(1949~1966)》,《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7—173页。
- [4] 李玮琦:《中国博物馆与女性形象呈现(1949—1966)》,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 [5] 郑振铎:《一年来“文物工作”纲要》,《郑振铎文博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 [6] 沈从文:《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沈从文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9—160页。
- [7] 陈鹏程:《北京历史博物馆》,《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
- [8] 沈雁冰:《提出对你市博物馆发展方向之意见》(51)文秘物字第229号(1951年11月22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案号53—1100。
- [9] 《中南区博物馆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12期。
- [10] 郑振铎:《故宫博物院改进计划的专题报告》,《郑振铎文博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11—212页。
- [11] 王冶秋:《反浪费,反保守,思想大跃进,工作大跃进!——1958年3月6日在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王冶秋文博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59页。
- [12] 据北大考古培训班的招生条件,参加培训的应是文物或文教单位在职人员可知,首届学员杨诒芳入职博物馆的时间应早于1952年,第二届学员孙泳贤入职时间应早于1953年,第三届学员刘贞廉、李彦欣入职时间应早于1954年,第四届学员张宗屏、马月贞入职时间应早于1955年;于善浦回忆自己1955年入职故宫博物院陈列部时,居瀛棣、沈令容已在图书资料室工作,其入职时间应早于1955年;薛雯1955任中国革命博物馆征集保管部主任,其入职时间应早于1955年;刘津1956年任故宫博物院办公室副主任,其入职时间应该早于1956年;庄云霞、朱淑仪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发表《友谊的竞赛》,介绍上海博物馆群众工作部导引组回应山东省博物馆群众工作组向全国博物馆群众工作组发起的倡议书后签名。由此可知,其入职上海博物馆的时间应早于1956年;伊文1958年任故宫博物院办公室主任,其入职时间应该早于1958年;邱辛1959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群工部主任,其入职时间应早于1959年;夏立平1961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征集保管部副主任,其入职时间应早于1961年;据程方英在《文物》1962年第12期发表的《三件明代瓷塑(上海博物馆藏)》一文可知,其入职上海博物馆的时间应早于1962年;江明1965年任故宫博物院群工部主任,其入职时间应早于1965年。
- [13]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第965页。
- [14] 《介绍北京大学博物图书馆学专修科》,《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7期。
- [15] 《“唤醒”妇好的女考古学家——郑振香》,《河北日报》2016年3月10日第9版。
- [16] 《介绍北京大学博物图书馆学专修科》,《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7期。
- [17] 李之檀:《沈从文先生的服饰研究历程(二)》,《艺术设计研究》2014年第3期。

- [18] 邓小昭：《西南师范学院图书博物馆专修科办学述评》，《图书馆论坛》2011年第6期。
- [19] 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教学小组：《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博物馆学专门化班》，《文物》1960年第5期。
- [20] 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教学小组：《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博物馆学专门化班》，《文物》1960年第5期。
- [21] 梁吉生：《21世纪：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学教育的沉思》，《中国博物馆》2001年第3期。
- [22] 王星光、李趁有：《毕生追求学术 风范永存人间——缅怀荆三林教授》，《中原文物》1993年第2期。
- [23] 谢遂莲、李思聪主编：《郑州市博物馆志（1957—1986）》，《中原文物》1987年特刊。
- [24] 谢遂莲、李思聪主编：《郑州市博物馆志（1957—1986）》，《中原文物》1987年特刊。
- [25] 曹鹏、冯令刚：《国学和见物是鉴定的基础——史树青访谈》，《中国书画》2003年第9期。
- [26] 这些以临时工或合同工身份进入博物馆工作的有一大部分是女性，因没有留下相关资料，其在馆内相应的培训情况无法进行更多的探讨。详见王学敏《河南省博物馆六十年来来的群众教育工作》，《中原文物》1987年第2期。
- [27] 叶淑穗：《许羨苏与鲁迅文物——记许羨苏在鲁迅博物馆的日子里》，《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9期。
- [28] 陈燮君：《锦绣华章融春秋——深切缅怀陈佩芬先生》，《上海文博论丛》2014年第1期。
- [29] 施宣圆：《她与青铜器相伴一甲子——悼念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陈佩芬》，《文汇报》2013年11月18日第11版。
- [30] 陈燮君：《锦绣华章融春秋——深切缅怀陈佩芬先生》，《上海文博论丛》2014年第1期。
- [31] 冯先铭：《怀念老院长吴仲超》，《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
- [32] 王莉英：《感念先师孙瀛洲》，《紫禁城》2013年别册。
- [33] 叶佩兰口述，赵伟整理：《回忆恩师》，《紫禁城》2013年别册。
- [34] 叶佩兰口述，赵伟整理：《回忆恩师》，《紫禁城》2013年别册。
- [35] 黄能馥：《恩师沈从文》，《上海采风》2018年第6期。
- [36] 李之檀：《沈从文先生的服饰研究历程（四）》，《艺术设计研究》2015年第1期。
- [37] 孙秀丽：《考古的“黄埔四期”——记1950年代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3期。
- [38] 徐湖平：《博物馆人才问题散论》，《东南文化》1989年第21期。
- [39] 宋庆龄：《“三八”纪念与家庭妇女生产建设》，《新中国妇女》1950年第8期。
- [40] 王莉英：《感念先师孙瀛洲》，《紫禁城》2013年别册。
- [41] 陈娟娟：《明代的改机》，《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
- [42] 李万万：《回顾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事业——陈瑞德先生访谈》，《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1期。
- [43] 李万万：《回顾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事业——陈瑞德先生访谈》，《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1期。
- [44] 《故宫博物院1959年大事记》，《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